

# 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

——读《五帝本纪》

周先民

## 一、严整慎重的史中之经

司马迁著《史记》意欲“原始察终，见盛观衰”<sup>①</sup>，“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sup>②</sup>，并唯恐“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sup>③</sup>。《五帝本纪》作为《史记》开宗明义的第一篇，正是其“原始察终”的开始，“通古今之变”的起点，以文采扬名于世的第一步。因此，雄视古今的文史巨匠司马迁对结撰《五帝本纪》必然是分外地聚精会神、精益求精了。虽然留传下来的关于中华民族的祖先的传说不多而且杂乱抵牾，记录他们的文字粗疏而且诘屈聱牙，但是司马迁凭着渊博的学问与深刻的识力，在其中去粗取精，披沙拣金，为杂乱的史实理出了系统性，让抵牾的传说呈现了可信性，使艰涩的文字变得流畅易读了。明代学者陈仁锡云：“《五帝本纪》乃太史公所极用意之文，其叙次征诛、揖让、朝覲、会同、圣人经世大典，严整慎重，一切齐諧怪語之書，不能輕入，所以為史中之經。”<sup>④</sup>“史中之經”，这是何等有力的断语，细读该传，通观全书，深感陈氏之评并非过誉，《五帝本纪》当之无愧。

## 二、“自黄帝始”的必然性

《五帝本纪》“自黄帝始”<sup>⑤</sup>，依次记载了黄帝、颛顼、饕、堯、舜这五位先帝的历史活动，司马迁追述中华民族的源头，为什么不从《易经》所言，上溯到更早的庖羲氏、神农氏，或者依照《尚书》所记，向后推迟到堯、舜？他为什么偏偏“自黄帝始”，并以黄帝、颛顼、饕、堯、舜为五帝？这是研究《五帝本纪》必须首先讨论的问题。

古来学者对此持异议者不少，比如：

东汉学者張衡说：“宓戲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並錄。”<sup>⑥</sup>

宋代学者胡寅说：“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sup>⑦</sup>

清代学者梁玉繩说“孔子刪《書》肇于唐、虞，繫《易》起于包、炎。史公作《史》，每祖述仲尼，則“本紀”稱首，不從《尚書》之昉二帝，即從《易辭》之叙五帝，庶爲允當。而乃以黃帝、顓、譽、堯、舜爲五，何邪？……若羲、農，實與黃帝、堯、舜爲五帝，安得遺之？”<sup>⑧</sup>

上述意見并非没有道理，然均为一管之見，未諳史家巨匠之匠心。我以为太史公如此选择，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性。茲试述如下：

### 1，考信历史事实使然。《五帝本紀》贊说的明白：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爲本紀書首。由此可知，太史公以黃帝为首作《五帝本紀》，是根据孔子所传的《大戴禮》中的《五帝德》、《帝繫姓》的说法，反复查考了《春秋》、《國語》中的有关史实的记载，再证之以自己在全国各地游历考察的闻见，然后才慎重摒弃了种种不雅驯的传说，郑重地“擇其言尤雅者”，写出了《五帝本紀》。又由于对于五帝，学者众说纷纭，所以司馬遷又不惜辞费，详细交代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其著史态度是审慎的，其立论根据是充足的，其论证方法是科学的，所以其选择必然是正确的。

2，釐清种族传承使然。中华民族的历史由中华种族的繁衍延续所组成，因此，要建构其完整的连续发展的历史，必须釐清种族传承的脉络，而中华民族有迹可循的传承历史正是自黃帝始。太史公是以“原始察終”为己任的，自黃帝始，正是其“原始”以釐清种族传承发展线索的努力。宋人羅泌说“窃观《太史公記》首推黃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禮·帝繫姓·五帝德》，盖纪其世而非主于三与五之说也；抑以为后世氏姓无不出黃帝者，故首而宗之。

至于羲、炎鲜有闻焉，是以不记，此太史公之本意也。”<sup>⑨</sup> 清人李景星也说：“孔子删《书》，断自二典，详政治也。太史公记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后世或居中国，或居夷狄。”<sup>⑩</sup> 确实如此，自种族传承角度观之，《五帝本纪》中的颛顼、饕、尧、舜均为黄帝后代自不必说，其后的夏、商、周、秦无一不与黄帝有着割不断的血缘联系。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颛顼、饕二帝虽然事迹比较单薄。无甚具体活动可记，但作为种族传承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理所当然地被列进了五帝的序列中。由此，中华民族的繁衍、传承、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一目了然了。尽管这其中按现代科学的分析眼光。还存在着种种漏洞或疑问，但是，太史公尽其可能地用大而化之的方法，精心归纳出的发展脉络，却显示出清晰的系统性，使中华民族的后来者们通过《五帝本纪》，明明白白地寻到了自己的根而有了温暖的归宿。

《帝王世纪》（《指海》丛书本）云：“太昊帝庖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该书虽为晋人皇甫谧所撰，但其所据必然是上古传说资料。如果太史公依这些传说，以羲、炎为种族源头，那么其历史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他的釐清种族传承的努力也就会付之东流了。

3. 顺应时代观念使然。《太史公自序》云：“继我汉继五帝末流。”

《高祖本纪》记刘邦在沛下起事，刚被推为沛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祠黄帝”。其用意不外是标榜黄帝是自家祖先，自己是黄帝的正宗传人，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夺取天下。可见，在汉人的眼光中，黄帝是天经地义的最早的祖宗。汉初又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推崇黄、老刑名之学。从历史事实看，黄帝的一生奋发有为，多有建树，与道家无为南辕北辙，但统治者推行无为政治，竟硬把黄帝拉来，当做无为而治的偶像。而不明底细的芸芸众生，只是冲着黄帝这块金字招牌，就对无为政治顶礼膜拜起来。可见，汉人对黄帝的崇拜之风多么强盛。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汉人司马迁追本溯源，认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自黄帝始，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4. 寓有规谏武帝之意。司马迁之世，正当汉武帝之时，武帝好言神仙，意欲长生不老，故备受方士蛊惑，以黄帝为仙人，曾叹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躡耳。”<sup>⑪</sup> 其走火入魔如此。司马迁置黄帝于《史记》书首，大书黄帝“修德振兵”、“劳勤心力耳目”、“未尝宁居”、励精图治之事，而对鬼神山川封禪之事，仅一言及之，最后又特意言明“黄帝

崩，葬橋山”。这样，就彻底戳穿了方士所言黄帝骑龙升天的荒诞不经，对执迷不悟的武帝不啻当头棒喝。清人蒋士学曾深刻指出：“《史記》不載三皇之事。豈其才学有所不能哉？盖子长之慨然怀古，而首称黄帝，正为汉武辨其怪诞荒唐之无足信也，如此则方士神仙之言绌矣。……史遷盖曰，以臣所闻，古黄帝何尝如此，而朝廷方惑于其说，又不能执书策所当考信者而力争之，则《史記》之首称黄帝，故阙三皇也。”<sup>⑩</sup>

综上所述，太史公以黄帝为首作《五帝本紀》，既符合于历史事实，又釐清了种族传承，体现了史学大家的史德、史识、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 三、五位一体的“类世家结构”

《史記》的人物传记，从所记对象上划分，可一分为三：一是“本紀”，传统领天下的帝王，二是“世家”，传独霸一方的王侯；三是“列传”，传各领风骚的贤人。若从传记的结构原则上区别，则仅可一别为二：一是以血统的延续传承为线索，串连起若干个人物，事迹著者则详记，事迹少者则略记。因大部分“世家”均属此类，故可名之为“世家结构”。二是专记某个特定人物，或是以类相从，合记几个没有血统关系的人物。因大部分“列传”有此性质，故可名之曰“列传结构”。依此原则，十二本纪显而易见可分属两类，自《五帝本紀》至《秦本紀》五篇应属前者，其中《秦本紀》的性质与“世家”并无大的区别，其他四篇“本纪”的传主均为统治天下者，与“世家”的传主有所不同，所以我把它称为“类世家结构”。十二本纪的自《秦始皇本紀》至《孝武本紀》七篇，属后者，传主均为个别的人物，结构上类似于“列传”，只不过所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贤人，而是代表着世界中心的皇帝及霸王罢了。

以上我们提出了《五帝本紀》具有“类世家结构”。它所传的五帝在血统上是前后相承的，黄帝为祖宗，顓頊帝为其孙，帝嚳为曾孙，堯帝为四世孙，舜帝为七世孙。这一点它与一般的“世家结构”同，但五帝间的内在联系绝不仅仅限于血源，它更进一步，在事业上又具有不可分割的五位一体、步步相继的关系。在那个筚路蓝缕的“创世纪”过程中。我们伟大的五位先帝，艰苦创业，前赴后继，励精图治，共同缔造了中国，凝聚起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上古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

是的，如果把缔造中华，凝聚民族，发展文明看作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

这个工程是由五帝的合力建设完成的。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个阶段，1，黄帝肇始奠基，2，顓頊和饯添砖加瓦，3，尧帝大力推进，4，舜帝全面完成。据此，我们可以发现《五帝本纪》存在着一个由四个环节组成的链式结构。

不用说，黄帝是创始人，是奠基者。他的这第一个环节最举足轻重，引人注目。因此，司马迁写“黄帝本纪”格外着力，它集中笔墨主要写了黄帝的两件大事：一是写其“未嘗寧居”地“披山通道”，“修德振兵”，先败炎帝，再擒蚩尤，统一了中原，为中华民族安下了家。二是写其在安家定邦之后，继续革命，“劳勩心力耳目”草创各种制度、励精图治的活动。这样，他“修德振兵”以定邦的事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他励精图治以兴邦的努力，为中华文明的提高、壮大指明了前进方向。

紧连着黄帝奠基环的，是由顓頊和饯这二帝组成的固基环。关于二帝，传中所写甚略，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仍历历可睹：二帝敬天祭神，发展生产。修身服人，取财节用，东西南北，四方巡察。使得普天之下，“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可見黄帝奠基的中华大厦，经过二帝的努力，其疆界更巩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更强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帝饯的后继者——帝尧就可以一显身手了。《五帝本纪》的第三个段落“尧本纪”写得相当详细，对尧“信飾百官，衆功皆興”的功绩都有所涉及，其中贡献尤大者有二：一是尧帝“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事实上开辟了一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解决了怎样去实现励精求治理想的重要方法问题。二是在继承问题上，他本着“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原则，将帝位传贤不传子，“卒授舜以天下”，保证了黄帝所开创、顓頊、饯及尧本人所推进的伟大工程后继有人。

舜当然不负重托，作为上古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发展链条上的最后一环，舜帝全面继承了先辈们未竟的事业，并根据新的社会实际，多所变革，多所举措，将其推进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对此，司马迁的“舜帝纪”有精彩纷呈的记载，择其要点，其功绩大略有：在社会日益变得复杂，凭一己之力很难治理的情况下，他不贪权势，而是敢于用人，“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他不自以为是，而是勇于纳谏，采纳众人的意见，以“百禹爲司空”，“以垂爲共工（掌百工之事）”，“以益爲朕虞（掌山澤之事）”，以伯夷“爲秩宗（掌祭祀之事）”，从而创造了以百官治众事的分工管理模式，完善了上古的统治制度。在依靠原始的自我道德束缚已不能防止犯罪的条件下，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舜帝果断地制定刑法，“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售戕過，赦，怙終賊，刑。”从而建立了司法制度。并且在执法过程中，他不畏权贵，“流四凶族，遷于四裔”，维护了法律尊严。舜帝还大大地扩展了统治范围，“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使得“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总起来说，在舜帝的英明统治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完善了，统治范围扩大了，不仅汉族的凝聚力更强，而且还吸引了许多少数民族，形成了空前的中华民族的大融和，把黄帝所肇始的伟大事业发展到了最高、最完善的阶段。

这就是值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子孙永远自豪的上古盛世，这就是五位先帝前仆后继，终于达成的輝煌成就，这就是《五帝本紀》通过五位一体的类世家结构生动展现出的“创世纪”过程。

#### 四，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

认清了《五帝本紀》五位一体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有了把握五帝形象的钥匙，因为《五帝本紀》五位一体的结构决定了我们必须用合五为一的眼光去理解五帝的形象特征。如果单独地分析每一个先帝的形象，也许会感到单薄，并且五帝之间的特征重合复叠之处较多，显得机械单调，但如果我们用综合的眼光，合而观之，就会发现五帝实在是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的典型代表，其基本特征有：

##### 1，有卓异的资质

在《五帝本紀》里，司马迁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对每一位先帝的资质都作了热烈的赞颂：

黄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動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帝顓頊高陽者，……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帝堯者，……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器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

对于五帝的过人资质，古代学者们大都信其真，现代专家们大都疑其真。我是宁愿信其真的。因为在那个开天辟地的原始年代，人类生存在极为恶劣的境遇下，人祸天灾频仍不断，如果不具备超乎寻常的智力与体力是不可能成为领导群氓的首领，去带领族人克服困境的，更不用说去谋求发展、征服外族以至天下了。五帝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伟大的成功，是和他们具有伟大的资质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尽管舜已久经考验，被堯确认有伟大的品格，但直到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神异的天资被确证无疑之后，“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也正由于如此，司馬遷在记述五帝的生平时，总是将其卓异资质放在首要位置予以强调。

## 2，有无私奉献的品德

卓异的资质，只是形成伟大帝王的先天条件，要成就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还必须有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班固说：“德合天地者稱帝。”<sup>⑩</sup> 鄭玄說：“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sup>⑪</sup> 《呂氏春秋》卷十五《下賢》篇云：“帝也者，天下之適也。”他们都认为帝应该是道德完美、大公无私、众望所归的人。这些看法固然很对，其实这是他们从五帝的行事中概括出来的。

且看黃帝：战争时期，他是夙兴夜寐，“未嘗寧居”，建设时期，他亦“勞勤心力耳目”，奉献出全部的心血精力。至于享乐呢，只是千方百计地“節用水火財物”。

再如帝嚳，他“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这是说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勤也時，其服也士”，这是说他公正廉洁，办事依照天时，客观公平，穿衣与士一样朴素。

堯、舜更加典型，他们一心一意为民谋利奉献毕生精力自不必说，在帝位的继承这个大题目上，他们表现了彻底的大公无私的精神，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为了中华民族的全体利益，为了伟大事业的后继有人，堯、舜大义凛然，传贤不传子，这种崇高无上的举动，怎不

令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子孙肃然起敬！

### 3. 有以民为本的意识

卓异的资质和无私奉献的品德使五帝的人格对中华百姓产生了极大的凝聚力，吸引着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之奋斗。而要成就前所未有的创造事业，就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民心的向背，是事业成败的决定条件。虽然“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sup>⑤</sup>的民本思想直到战国孟子才明确提出，但是，五帝的伟大实践，已经使他们认识到争取民心的重要，因而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重视民心，以民为本的意识。且以黄帝统一中原的征服过程为例。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黃帝以除暴安民相号召，以“修德振兵”为纲领；治五行之气，以顺应天时；种五谷之粮，以养育百姓；度四方而安托万民，以凝聚民心；教百姓习战，冠以猛兽之名<sup>⑥</sup>，以威摄敌方。于是一战败炎帝于阪泉，再战杀蚩尤于涿鹿，所向披靡，统一了中原。应该看到，虽然这里记述的中心是“振兵”的过程，但同时也突出了其“振兵”之胜来源于“修德”之功。黄帝为制止“暴虐百姓”的行为而“习用干戈”，兴的是正义之师，他“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謀的是万民之福。正因为黄帝争取了民心，取得了民众的支持，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因此，修德抚民是黄帝取胜的关键。学者们一般认为此段主要取材于《大戴禮·五帝德》等篇，然而《五帝德》记此事相当简略，与“修德撫民”之旨无甚关涉。可见，黄帝的“修德撫民”的举措，并非司馬遷随手抄来，当是从诸多传说、史料中悉心整理、概括而来，从这里我们既可窥见黄帝思想中存在着以民为本的意识，又可发现太史公卓越的史识。

黄帝之后，帝嚳也是“順天之意，知民之急”。堯帝更是以“便章百姓”为治理天下的出发点，因为他明白，只有“百姓昭明”，才能“合和萬國”，实现大治。以民为本的意识在舜帝那里具体化作了各种具体措施：舜因感到“黎民始飢”，便命弃为农官，“播時百穀”；担心“百姓不親”，便任契为司

徒，“敬敷五教，在寬”；为了听到下民心声，又命龙为“納言”，让其将下言及时纳于上。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五帝们的民本意识，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强烈了。

#### 4. 有创造革新的精神

卓越的资质、无私奉献的品德和民本意识，为五帝事业的成功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但是五帝们所进行的是前所未有的创造，是要从原本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所以要取得伟大事业的最后成功，还必须有强烈的创造革新的精神。五帝们前仆后继，建成上古盛世的过程，即是一个创造革新的过程。对于这一点，本文在论述《五帝本紀》结构时已多所涉及，这里为免重复，仅以五帝们治民的方法为例：

黄帝的方法是：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当时社会简单，民性淳朴，所以黄帝主要采用了顺应民性，听其自然的方法。

顓頊的方法是：

治氣以教化。

司馬貞《史記索隱》解釋說：“謂理四時五行之氣以教化萬人也。”这表明为适应社会发展，顓頊帝对黄帝顺性之法有所革新，增加了“教化”这一人为因素。

帝嚳的方法则又不同：

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撫教萬民而利誨之。

他一是以身作則，以感召天下，使人信服。二是在以理“撫教萬民”之外，又加上了以“利誨之”的手段，显然与顓頊相比，又有所创造。

堯时社会更加发展，，情况日益复杂，堯的对策是：

能明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萬國。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他一方面对嚳的修身服人原则加以发展，使其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系统性；一方面又适应现实，多所创设，“信飭百官”，从而收到了“衆功皆興”之效。

以上都是用正面诱导教育的方法来治民，但随着生产力的长足进步，到舜时，人民的需求越来越多，食欲越来越强，犯罪现象开始增多，用正面方法已不足以维持安定的社会秩序，于是舜对治民方法进行了根本性的创造革新：在

坚持正面教化的同时，制定了法律，以刑求治：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戕過，赦；怙終賊，刑。

从而惩戒了“寇賊姦軌”，使得“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保障了社会秩序，实现了天下大治。

所以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五帝们各自具有銳意进取的革新创造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不断蓬勃发展而又长治久安的上古盛世。

综上所述，五帝们既有先天的卓越资质，又有无私奉献的高贵品德，既意识到民心重要，因而处处为民谋利，又富于开拓意识，不断创造革新，称之为尽善尽美，是名副其实的。

作为开宗明义的“史中之經”，《五帝本紀》刻意创造五帝这一群尽善尽美的理想帝王的伟大形象，刻意突出这一群象的四个基本特征，是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示例意义的：它树立了一个理想帝王的最高标准，为评价后代帝王的善恶美丑、功过是非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鏡，实际上司马迁对历代帝王的历史评价也就寄寓在对五帝基本特征的揭示与赞扬里了。比如秦始皇与汉武帝，他们都具有过人的资质，都富创造革新的精神，为历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这些方面，他们是善的、美的、有功的。但同时，他们又轻视民心，不惜民力，为满足食欲而劳民伤财，在这些方面他们又是恶的、丑的、有罪的。再如刘邦与项羽，两人都是一代豪杰，都有种种长处，但在顺应民心，以民为本这一点上，刘邦是远胜项羽的，所以后者被淘汰也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顾炎武认为唯太史公能于序事中寓论断，<sup>⑩</sup> 确为不刊之论。我读《五帝本紀》深深感到其叙事中寄寓着司马遷以五帝为鏡、对照与评价历代君王的苦心，当不属误读吧。

## 五，“擇其言尤雅者”

前面说过，司马遷著《史記》是有意要以文采表于后世的，作为开宗明义的第一篇，《五帝本紀》在文辞方面，毫无疑义也是有示例意义的。

读《五帝本紀》赞，我们可知，司马遷为作《五帝本紀》搜集到的有关资料是很丰富駁杂的，“學者多稱五帝，尚矣”。当然其中也混杂着许多“不雅馴”、“難言之”的地方。对此，司马遷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擇其言尤雅者”<sup>⑪</sup>

“擇”有“选”意，《說文解字》云：“擇，束選也，從手，睪聲。”“擇”亦有“取”意，《呂氏春秋》卷二十《驕恣》篇有“其所擇而莫如己者，

亡”之句，高誘注曰：“擇，取也。”可見司馬遷所說的“擇”，當含有“擇善而從”和“博取衆長”這兩層意思。那麼，司馬遷“擇善”與“博取”的標準是什麼呢？即是“言尤雅”。“言”指言辭，說法，“尤”為程度副詞，修飾“雅”。“雅”亦有二意，一為“正”，含正大，正確，公正等意。一指“有文采”，賈誼《新書》卷八《道術》篇云“辭令就得謂之雅”。可見，司馬遷對言辭非常重視，既在內容上追求正確，又在表達上講究文采，並以此作為其“擇善”與“博取”的標準。

語意既明，當証諸實例。為求明了，下面擬以《五帝本紀》引述《尚書·堯典》為例，說明司馬遷在“擇其言尤雅者”時所表現出的文學創造。

一是化艱澀為平易，使語言通俗，語氣自然，語意明暢。比如：

《尚書·堯典》記堯帝事功曰：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五帝本紀》則云：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卷一分析說：“史公‘允’為‘信’者，《釋詁》文。‘釐’為‘飭’者，鄭注《易·噬嗑》云：‘飭，猶理也。’《詩傳》云：‘釐，理也。’是釐、飭同義。‘工’為‘官’者，《詩傳》文。‘庶，衆’、‘績，功’、‘咸，皆’、‘熙，興’，並《釋詁》文。”由此可知，針對《尚書》文字古奧難懂的特點，《五帝本紀》在引用時創造性地用訓詁字去代替古文，比如上引八字除了一個表示數量的“百”字未改動外，其餘七字全都改用當代通行易懂的文字，使讀者一目了然。值得一提的是，《尚書》“允”字，《史記》在引用時一律改作“信”字，如《尚書·皋陶謨》中“允迪厥德”句，《史記·夏本紀》作“信其道德”。可見化難為易，是《史記》引用史料的一個原則。

二是刪繁雜為簡潔，使記事重點鮮明突出、比如，《尚書》記述舜任命垂為共工時寫道：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恣，垂，汝共工。”

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五帝本紀》則云：

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為共工。

《尚書》用記言方法，完整記述了全過程，登場人物除帝與垂外，尚有僉，殳斯，伯與等三人，所述事實除了舜帝用人之外，還有垂的讓賢。這樣寫來固然

生动，但是，其主旨是褒扬帝的用人之明还是表彰垂的让贤美德？并不很明确。《五帝本紀》则不枝不蔓，改记言为述事，登场人物除帝与垂外，其余人则用一“皆”字泛化，同时又删去记垂谦让的一节，从而也就使记事的主旨凸现出来了：史公意在宣扬舜帝纳谏用人之美德也。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一疑此不载垂谦让，当为史之脱文，或亦有理；但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从积极的立场去讨论史公如是写的合理性，当更有益处。

三是旁征博引，增事生华，使得记事完整，或文采焕发。比如《尚書》记尧使舜摄行天子之政时云：

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

《五帝本紀》则云：

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

《尚書》记事很简，留下很多疑惑。司馬遷则作了很多补充。一是在“受終於文祖”前加一主语“舜”字，使文义更明晰。二是用“文祖者，堯大祖也”七字，解释了“文祖”谓谁，屈萬里《尚書釋義·堯典》“受終於文祖”条下注云：“文祖，文考，文母，前文人等，乃周人之習用語也，……指亡祖，亡父……言。”司馬遷以“堯大祖”释之，其义明了简洁。三是根据《孟子·萬章上》“堯老而舜攝也”的说法，加以补充发挥，又形成“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这段文字。这样，就把尧命舜摄政这件事的具体过程交代清楚了。

再如记述尧帝资质性情一段，《堯典》曰：

欽命文思安安，允恭翹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五帝本紀》则云：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

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

兩段文字，前者古奥朴质，后者则用比喻，用排比，很有文采。考《五帝本紀》叙尧、舜事基本用《堯典》，而偏偏这里舍《堯典》而转征引《大戴禮記·五帝德》之说，并加以精心雕饰，可见史公袭用《尚書》，也丝毫不忘记对文采辞章之美的追求。

四是加强记述的感情色彩，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堯典》记尧死之况说：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五帝本紀》则云：

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

后者对前者的改动主要有两处，一是将“百姓如喪考妣”一句改成两句：“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使“悲哀”之情，更加突出；二是将“四海遇密八音”句改为“四方莫舉樂，以思堯”，把思念的对象是“堯”这一点强调出来，以凸现百姓悼念、追思堯的感情。通观两文，前者紧凑简洁，着眼于记事；后者舒缓从容，注重于抒情，效果是不一样的。

力图使语言平易，富于文采，追求叙事完整，重点突出，善于旁征博引，充实史料，注意加强感情色彩，这些正是《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的内涵，它成功地大大提升了《五帝本紀》的记事水准，包括历史和文学这两个方面。推而言之，整部《史記》，不也正是司馬遷概括分析所有史料“擇其言尤雅者”，而结出的丰硕果实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帝本紀》对《史記》全书的文学创造，亦具有开宗明义的示例作用，不也是合乎实际的吗？

注释：

- ① 《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標點本，下同）。
- ② 《文選》卷四十一《報任少卿書》。
- ③ 《文選》卷四十一《報任少卿書》。
- ④ 《補標史記評林》卷一引，（蘭臺書局影印本）。
- ⑤ 《史記·太史公自序》。
- ⑥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中華書局標點本）。
- ⑦ 《斐然集》卷二十一《復州重修伏羲廟記》（《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 ⑧ 《史記志疑》卷一（臺灣學生書局影印本）。
- ⑨ 原載《路史發揮》卷三，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第316頁，因未找到原书，故未能核对，请原谅。
- ⑩ 《四史評議》卷一，（岳麓書社1986年11月版）。
- ⑪ 《史記·封禪書》引。
- ⑫ 原載《蛟川先正文存》卷一四，转引自《历代名家评〈史记〉》第322頁，因未找到原书，故未能核对，请原谅。
- ⑬ 《白虎通》卷一《皇帝王之號》，（《抱經堂叢書》本）。

- ⑭ 《易緯坤靈圖》（《聚珍版叢書》本）。
- ⑮ 《孟子·盡心下》（《十三經注疏》本）。
- ⑯ 对《五帝本紀》中“教熊羆貔貅貙虎”句有諸解，張守節《正義》案曰“言教士卒習戰，以猛獸之名名之，用威敵也。”这里采此说。
- ⑰ 顧炎武《日知錄》（明倫出版社《原抄本日知錄》）卷二十七云：“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于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
- ⑱ 《史記·五帝本紀》贊。